

14

常常会想起一个叫石头的人,一个喜欢在生活中自讨苦吃的人,乐在其中。他是一个喜欢同自己谈话的人,一个愿意和自己谈话的人,想必他的思想和感情一定是往纯粹的地方走,这样的人我喜欢。

有些时候,我们对面坐着,不说话。一壶茶是距离。也许很久没有一个字吐出,他就那样端端正正的在我对面教我泡茶。石头写诗,用身体力行写。不知道他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,那个地方一定是他愿意并想去的地方,没有人能够阻挡一个人想去。他从那个地方回来后,就写诗,或者在路上时,诗歌就已经成行。他的消息总是用秒来计算,听到时已经没有了消息。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,人是很难以自知之明的。和他谈话,就是说诗,诗歌里怎么能有自知之明?我便不语,不语了就喝茶。

有一天,一个朋友取了几首诗歌放在我面前要我读,我一读就发现了其中有一首是石头的诗。朋友用做学问的眼光挑剔他的诗歌,说石头用熟练的手法在洗一副修行人的“牌”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在世间行走,人总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斑驳。

每天早晨,我和很多人一样,打开手机以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看微信。这是标志性的晨曲。

在打开微信的一瞬间,就可以接收到四面八方的问候,远在天边的朋友一下子拉近到了眼前,如见其人如闻其声。美好的一天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
微信金句颇丰,最暖的应该是这一句:我们每天在微信里相遇问候。

于是读到了某人签名售书的预告,看到了某人应邀出席大型演讲会的现场直播,最为厉害的是一位朋友晒出了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制作的视频剪辑,历史资料丰富,极为震撼,的确不凡。

送上一朵红花点赞,发两个大拇指表示鼓励,来三个拥抱为最高级别的赞赏。

当然,也有至暗时刻。那是一个很小的群“少年五行”,一共五位发小。某日,突然发现一位每天发信息问候的罗君连续数日没了音信,连忙互相打探,都不知道。顿时慌了手脚,偏偏无人有他的新址:他的手机永远铃声一直无人接听。最后消息:夫人

1992年3月,在东京六本木国际会议的茶歇时,学者们在讨论重大新闻——日军“慰安妇”问题。一位日本教授得知我来自上海时便发问:据说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,你知道吗?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我,并不知道上海竟然也有日军慰安所。于是我开始在日本搜集战争记录和老兵证言。

1993年6月,我从东京回到上海,即开始调查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——大沙路,找到了曾在里面打工的陆明昌,地处东宝兴路125弄的这座建筑已予以保护。然后根据日本军医医生彻男的回忆录,查找“杨家宅慰安所”,最后确认地点在翔殷路东沈家宅(今翔殷路300弄海林小区);我们找到了日军运来的木材、清酒瓶、不锈钢碗和烤火用的大瓷缸,还找到了被日本兵杀害父亲的沈美妮(1931年生),被日本兵征用去建慰安所木屋的史留留(1919年生),还有沈福根(1917年生)、沈德福(1918年生)等,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年来年过

葛水平

某一瞬,我眼中无意间泄出的刁蛮,竟如利刃般划过身旁之人。不过片刻,心绪便已平复——因那被伤的,原是个自矜之人,这般计较,倒显多余了。

而石头不同。他从不恃傲之辈,总愿与自己作一场理性的对谈。他懂得,尊重自身的性情,便是珍视父母刻在血脉里的馈赠。石头常念起他的兄弟,开口便是一句:“噢,那人真是了不起。”这轻轻一语,原是他与内心对话后的澄澈,是悟性从幽暗中挣脱,终至敞亮的明证,更是人性深处那点仁爱,如晨露般在枝叶间悄然彰显。

石头的诗是什么样子的诗歌?他说了:已厌烦所有的诗歌手段,所有的做作的。用最少的汉字、最明了的语言,在诗歌的临界点上写诗。一切皆从内心流出,流出即是。也就是:写到诗里没有诗。

石头在诗歌里说老:如果不是越老越天真,老有什么意思呢?

石头的诗歌不拿捏,如他人一样,不拿捏的人

可以做友。石头好茶,交了茶友。石头好诗,交了诗友。

去年秋天我和石头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一个叫黑山背的地方,那个地方真好。满山沟香椿树,一个叫常大庆的老人住在那里。老人八十二了,安安静静住在石头屋子里,干干净净的柜子上能照见人老脸。我们就把帐篷支在老人的院子里,常大庆不是我们所有人的亲人,黑山背也不是我的故乡。距离往往不是还乡的障碍,还乡的意义也不完全是因为异乡有什么不妥,只是想寻找一种在一起起理由。在一起是为了说话,是为了互相照镜子,红红脸。常大庆老人的生活状态给了我一个老年时的样子,丝毫没有临近死亡的慌乱,真好。两天时间里,我就把自己的虚张声势地呈现了出来。夜里不睡,稀罕那高空一轮圆月,白天不洗脸梳头,蓬头垢面走在野地里摘过季香椿。常大庆一辈子住在黑山背,干干净净,我两天就照住邋遛的路上走。灵魂的锯齿,生存的陷阱,信念的血痕,万物的疼痛以及掌控作秀的热爱,迅速让我溃败而去,只有一个目的:赶



仙桃 (中国画) 李知弥

快回城市里洗一次热水澡。本来石头还想多住几天,因为我的原因只能离开。那一时刻,无论好坏,我不由得捡起了人所共趋的虚荣。我在石头面前不能醒悟。石头说:因为我已经不是东西。

那么我是什么东西?我想起石头常常一个人走,一走几天,走哪睡哪。季节冷得叫人发抖了,他走在雪白的光华与沉静中。他说:“万物自山中走出,便染了尘;人若离了山去,便失了本真。”

石头的许多话,总像惊鸿掠过,不教人防备,却也不供人仰望,转瞬即便隐入寻常,如从未说过一般。

每回途经太原,无论是转机稍歇,还是刻意停留,我总会发一条信息给他:“转机,不见。”可只要



仙桃 (中国画) 李知弥

双脚脚踏在这片土地上,终究还是要去见他的。他总在“天街小雨”三楼,盘腿而坐,煮水泡茶等我。我便坐在对面,一整个下午,茶在杯中起落。那茶的滋味,早已喝乱了我的心绪——此后我再旁人的茶,脱口便是一句:“不如石头的茶。”

石头说:你到年龄了,该喝点好茶。我笑说:是草入水都好。石头说:好的茶好,路数不能走野。我笑说:有生之年就等兄弟孝敬了。石头:哈哈。我也:哈哈。

之后不说话,有刻意的沉默。此时的沉默恍如我的诚实不欺。

喝茶。年来年过,春天再说。

“一心多用”在生活中比比皆是。比如说:边吃午饭边在电脑上工作,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一边跑步一边用手机打电话,开视频会议时用手机发短信等等。

科学家不这么看。他们认为大脑只能在一个时间做一件需要投入注意力的事,当我们自认为是“一心多用”的时候,其实是在快速地切换所做的工作,在切换做事的过程中,人需要不断地回顾前一件事做到哪里了,这就使得做事不会有创造性,且易犯错。所以,“一心多用”其实会造成工作质量低下,那些自诩能同时做几件事的人肯定是说谎。

事实是,当我们知道“30分钟后必定会休息”的时候,工作会更专心致志,而在10分钟的休息期,你可以做除了“工作”以外的任何事——喝咖啡、看电视、逗一下小猫小狗等,有条件的到户外走一圈,你会发现重回工作的时候头脑清醒、思路敏捷。

美国犹太州立大学某教授做过一个“模拟驾驶”的实验:要求被测试者边开车边讲电话,结果,大多数人脚踩刹车的反应慢了下來,或者是和别的人相撞,与此同时讲电话也得不到要领了。但是有个别人是例外。研究显示这些人能同时应付各个渠道的信息,并照样处理得有条不紊。他们大都有着特殊的职业背景,如高端厨师、战斗机驾驶员或职业运动员,这类所谓“超人”大约占2.5%的比例。崇尚“一心多用”的人利用每一个停顿做点别的事,比如说在等待网页下载时回复邮件,一边收帐一边给另一个客户发货,有些人的电脑屏幕往往会有12个打开的浏览器,还有5个没有写完的邮件,别忘了,他们的出错率往往也最高。

“一心多用”是谎言

周炳掇

上世纪60年代,我在读过高中后被父亲万里送到河南西华县农业第一线劳动。临行前,父母亲仅送我15块钱,外加一本1959年全国劳模大会所发的日记本(红色封面上镶有毛主席金色头像),他在扉页上用钢笔题写“一遇动摇,立即坚持”八个大字叮嘱。父亲说你要自食其力了。

秋冬交接之际,园艺场党组织提出要把“冬闲变冬忙”,因此就挖沟渠灌溉果园里1万万多棵苹果树和葡萄树;还要趁树木冬眠时对枝条进行修剪,锯下挡光不通风的侧枝。我迎风冒雪爬到果树的主干上进行空中作业。除此之外,为了丰收必须积肥、拾粪。农人说:“种地不上粪,等于瞎胡混!”

一开始,二队的工人送我一个多余的无人使用的紫树槐编成的粪筐,真是又笨又重,粪没拾多少,肩上负担却不小。组长楚师傅对我说:“明天休假,咱俩去找白蜡条,保证比你这个紫树槐的轻巧一半多呢!”

师徒二人迎着金风踏着头茬薄霜,直奔几里路外北边的果园防护林。我们怀揣利刃(剪枝剪)拨开一层又一层紫树槐等杂草树丛。楚师傅说,这羽状对称小叶和玉白色主干,就是难觅的白蜡条。虽然戴着帆布手套,还是被灌木丛上的尖刺刺破了手指,鲜血直流。树丛中,我俩钻进爬出,顾不上刺扎路陷,忙活了大半天,剪下下来两大捆白蜡条。我喘着大气兴奋地学师傅捆扎,再把这足足有两米长的白蜡条扛上右肩,奔向我们知青居住的草顶泥墙集体宿舍。

两大捆白蜡条足够编上三四个小粪筐,第二天就摆下了编织场。我恭敬地给楚师傅充当下手足蹬手割,把冒着新鲜清香气的白蜡条削去细的梢梢和主干上纷杂的小细枝条,最粗壮的根根就是宝贝,可以砍下来做小粪铲和镰刀的握柄。白蜡条小灌木真是农家的宝贝心肝,木质密度很高,所以轻巧,其柔韧度极好,不易折断。电影《少林寺》中和尚们手持的“齐眉短棍”就是用这种白蜡杆做的。三国时期魏大将钟会亲兵曾使用白蜡杆制作的棍棒作为制式武器,明代秦良玉组建的“白杆兵”将白蜡杆枪改良为带刀钩与铁环的多功能武器;甚至,现代传统武术比赛中,也规定枪杆必须使用天然白蜡木。

用白蜡条编制粪筐是要发挥它独特的柔韧性,刚刚剪下的枝条要趁着新鲜柔软进行编制,如搁置时间过长,就要再经水浸和烤制,才能使其柔软,否则就很难使用呢。古人说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我用亲手剪下的白蜡条,学会了编织小粪筐和制作小粪铲、镰刀把,从此,用此筐拾取的精粪堆天天都在增高。后来,我又特意给了一分场郭世英一个白蜡条粪筐,他是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下放来的。无论是拾粪还是“三夏”“三秋”,世英兄总一马当先奋勇争先。有一次,世英去供销社买烟叶,在路上看到一大堆冒着热气的马粪,由于都没带粪筐。他就摘下草帽,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,“我要不捡,就便宜了别人,我得让我的粪堆天天见风就长啊!”果然,在全队和一分场丈量评比精肥时,郭世英得了第一名。他就是这样拼命改变自己,而我有些惭愧,只是在努力劳动按时作息而已。我虽然也受到过黑板报的表扬,但那只是一次鼓励,三夏时我明显属于“后进部队”。记得首次割麦时,由于体力不支抓不住一把满手麦秆而频频回镰,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,农场姑娘开玩笑:“小万同志,跟你说话要‘挂长途’了呢!”郭世英通过拼命劳动来改变自己,获得了“农场劳模”称号。(但是,他却并没有逃过十年“文革”,在造反派猛烈批斗中,跳楼自尽,那是1968年,年仅26岁。)世英兄小心翼翼地把奖状带到北京,双手送给其父郭沫若,老人家看后老泪纵横地说:“你的艰苦行动不仅教育了你们年轻一代,也教育了我这老一辈人呢。”世英兄去世后,郭老还用毛笔手抄了郭世英创作的儿歌《小粪筐》: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小粪筐,你给了我思想,你给了我方向,你你永远在齐唱。

此儿歌见郭世英1963—1965农场劳动日记,现藏于北京郭沫若故居。

每天问声好

管新声

早逝的他曾邀请群里的位一起去南通新购房子同住。正乱了阵脚时,“少年五行”中有一位总算脑子清爽过来了,他原是《新民晚报》退休的老编辑,突然想起报社里有一个“帮帮忙”的部门,立即一只电话过去提供了相关信息,三个小时之后来了回音:去南通的发小在孤身一人的房间里跌了一跤,绝无干扰地往生去了,呜呼哀哉。

每天的微信,起码报送了一个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日常信息——普普通通的平安健康信息就是最大的安慰。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因此,我每天发送的图片绝不敢掉以轻心。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最近挑选的是国外著名摄影大师的剪影作品;前些时日发给朋友的则是齐白石徐悲鸿大师的精品佳作。其实,每日的微信吉祥图片是值得如此付出的,它可以让你快乐度过每一天,我乐此不疲。

感谢现代科学给了我们如此便捷的联络方式,遥想当年的书信飞鸿电报电话两地书,真是恍如隔世。俱往矣,已是微信时代,换了人间。

于是,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。1997年7月8日,我担任上广左安龙主持的“市民与社会”节目嘉宾,讲述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往事,市民纷纷来电,提供信息。左先生一看欲罢不能,马上宣布第二天继续访谈,我得到了不少帮助。有位番禺中学的退休教师陈炳荣写信说,日军占领浦东时即控制他家,在楼房设立军官慰安所,平房设立士兵慰安所。如今陈家老宅——钱仓路350号已作为优秀建筑予以保护。现在,我们对上海慰安所统计,从最初我预想的4个增加到182个慰安所。

此后,我们将调查推向全国,在22个省市进行田野调查,从黑龙江到海南岛,现在我们能确认的日军在华慰安所超过2100个。

日军“慰安妇”研究33年的历程

苏智良

由于日本在战败时拼命销毁文献档案,给日本侵华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所以,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幸存者作为证人非常重要,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我们在崇明岛上找到朱巧妹、陆秀珍和郭亚英3位幸存者,央视白岩松团队进行了重点报道。我们又又在市区找到来自朝鲜的朴又得和玄炳浩老人。在记者、律师、干部、农民、职工各地志愿者的配合下,在全国找到了358位受害幸存者,她们中受害时最小的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女,中国的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总数在20万人以上,如今我们所知的在世幸存者只剩下7人了。

1995年开始,24位中国受害者到东京地方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推行性奴隶制度,尽管最终败诉,但法院承认了加害和受害的事实。大量证据表明,日

本政府在二战期间强征各占领地、殖民地地妇女作为军事性奴隶,推行建立了“慰安妇”制度。与此有紧密关联的有陆军省、海军省、厚生省、外务省、法务省、警察系统等部门。

像日军“慰安妇”这样的战争苦难是否也要保存记忆,在我们国家是有分歧的。另外,历史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大有市场。在日本,从前首相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,都有过“慰安妇是人贩子的责任,与日本政府无关”的谬论。

尽管二战结束已80年,但关于二战的评价仍有很大的争议。中国学者应全面地走向国际舞台,推介成果,针砭谬误,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。(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)

十日谈

80年:追忆、追问
责编:刘芳 沈月明

提篮桥的正义判决,请看明日专栏。



终生难忘的白蜡条

万伯翔